

欧洲文献中的土伯特:以 13 至 18 世纪为重点

陈波

摘要 13 至 18 世纪欧洲有关土伯特(Tibet)的文献中,用以指涉土伯特的符号繁多,拼写形式各异,所指亦千差万别。其中,蒙元时代形成的三个关于土伯特的直接知识传统,在现代早期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把土伯特归属鞑靼范畴,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初期,欧洲学界才开始将之转属知纳(China);1580 年代以后欧洲传教士从实地发回报道,提供有关符号及其所指的新知,包括现在普遍接受的拼写形式 Tibet 和藏文化中的地理分类系统;深入的当地知识和欧洲认知框架之间的不一致关系导致欧洲东方学中出现二重土伯特观,跟二重知纳观交织,并与之一道成为其表述的内在机制、困境和缩影。

关键词 土伯特 知纳 鞑靼 二重土伯特 二重知纳

作者陈波,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5)。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9-0162-15

13 世纪前期蒙古大军西征,引起欧洲的震动^①;其后果之一便是若干使者前往东方。他们的见闻有涉及土伯特的地方,成为欧洲最早关于这一区域的知识,其影响长达三四个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尤其 17、18 世纪,传教士有涉足藏区的,始有关于这一区域的新知识陆续出现于欧洲知识界。这些不同时代关于藏区的知识是如何协调、整合的?它们如何反映东方不同区域间的关系?本文将侧重考察这两个议题。笔者认为,象征符号和所指的链接功能在欧洲知识界理解、想象和建构土伯特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洲对喜马拉雅区域的了解始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公元 1 世纪老普林尼记载来自印度和中国(Seres)的商品。托勒密地理学在欧洲现代早期得到复兴,也对认知这一区域产生影响。西历纪元 10 或 11 世纪早期的印度梵文文献中提到 et-Turbet, el-Tubbet, Thobbet 和 Thobbit^②。10 世纪的波斯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中写作 Tubbat 和 Tuput,^③其他的波斯文形式有 Tibit, Tibbit, Tibbet, Tibat, Tibbat, Tibbut 等,蒙古文则是 Töböt。巴赞等认为类似的名称是中世纪欧洲的旅行者结合波斯形式和蒙古文形式而来的,波斯形式来自阿拉伯文,而后者则是粟特文 Twp'yt(读如 Topet)的对音,这是所有拼写形式的雏形。^④

伽丕尼(Friar John of Pian de Carpine)在 1245—1247 年间前往贵由汗宫廷之旅后称之为 Burithabet;鲁布鲁克于 1253—1255 年间东游后的记录中用 Tebet;波斯学者瑞师德丹丁(Rashideddin, 1247—1318)用

① 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in *Studia Tibetica*, ed. Helga Uebach and Jampa L. Panglung, Munich, 1988.

② 巴赞等认为,带 -h- 的拼写法跟 th 一样,没有真正的语音意义,是中世纪用拉丁文拼写外来词的传统,可以不予考虑。参见路易·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耿昇译,郑炳林主编:《法国藏学精粹》(4),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328 页。

③ 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pp. 305-306.

④ 路易·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第 1328—1329 页。

Buri Tibet^①；《马可波罗行纪》的不同版本中用过 Tebet, Thebet^②, Thebeth^③, Thebethe^④；鄂多立克写作 Tibot/Tybot；曼德维尔的著作中用过 Piboch, Riboch, Ribok, Riboth 和 Rybot 等^⑤；Tibet 是 1624 年安夺德所用。普查斯 (Samuel Purchas) 著中出现过 Tebeth；1633 年伯立 (Cristoforo Borri) 用 Thibet；1683 年康特利 (Giacomo Cantelli) 用过 Tobat^⑥。1671 年蒙塔努斯 (Arnoldus Montanus) 在《知纳图志》中同时使用 Tibet、Thebet 和 Tebet^⑦；1681 年摩尔 (Jonas Moore) 用过 Thobrot^⑧。

这些符号各不相同，所指也千差万别。据统计，从 13 至 15 世纪的欧洲文献中，有关土伯特的名称有二十九种之多，1747 年统计时亦有二十种不同的名字。^⑨ 本文研究它们尚未统一为 Tibet，所指也不固定的历史之最初一段^⑩。

地名翻译的跨文化过程^⑪

在方法论上，当代欧洲—西方的藏学界在讨论欧洲有关 Tibet 历史的书写时，大多不会去留意身边的汉学；而汉学家们也基本上不关注藏学著作。这种学术壁垒，显然跟西方学界在世界各地建构民族—国家体系的工程有关，并且是这一体系的反映；对本议题的研究来说，影响甚大：沟通它们将产生重大的新知识后果。

西方文献中的 Tibet，指的对象跟藏语中的“博”（བོད Bod）和汉语中的“西藏”有些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如今要说清楚它们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项重大的认识论上的任务。间隔半个世纪之远，任乃强、吴世昌、王贵等都曾先后对此做过类似分析，可见这一议题具有核心的地位。任乃强在 1933 年的《西康图经·境域篇》中提出英文中 Tibet 所指跟中文“西藏”所指并不相同，Tibet 只能译为“土伯特”，不能译为“西藏”；而中文“西藏”一词，只能英译为 Hsi-zang 或 Tsang-po，而不能译为 Tibet。^⑫ 这个思路值得继承和发扬；但由于他没有涉及英文中的知纳 (China) 及其翻译，问题只解决一半。

1995 年，王贵与喜饶尼玛、唐家卫合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批判西方的西藏独立论倡导者范普拉赫，维护西藏自元以后归属中国的历史和地位时，第一章就讨论这三种语文中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根据英文概念源出中国概念、“名从主人”的原则和中国历史、政治事实，尝试定义英语中的 China 为包含 Tibet 的概念。^⑬ 这一努力拓展了任乃强的思路，值得肯定；但和任氏的进路一样，这一定义需要我们大量的后续学术工作，才能对欧美学界和民间起作用，尤其要求我们深入到欧美学术的脉络之中，找到其肯綮之处，并挖掘西方文献中能支撑这一定义的资源。这样做，可转换西学的话语体系，使之符合事实，也使我们定义它们的关系时在学理和事实层面上都能顺理成章。

1934 年吴世昌批评日本扩张主义者通过操弄“满洲”与“支那”关系来侵略中国的实质，论及西方的族性地理分类系统跟中国体系之间的鸿沟，尤其指出前者对后者的裂解潜力。他的讨论并不限于满洲：他还

① Rockhill, W. W. trans.,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1900, p. 151, fn.

② 这个用法容易引起混淆，因为它也指约旦以南的 Edom 王国所属的一个镇。Heylyn, Peter. *Cosmographie in four books*, London, 1652, p. 102.

③ Polo, Marc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A.C. Moule & Paul Pelliot Trans. London, G. Routledge, 1938, p. 271, Fn. 3.

④ Polo, Marco. *The most noble and famous trauels of Marcus Paulus*. London: H. Bynneman, 1579, p. 77.

⑤⑨ 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p. 307.

⑥ Romolo Gandolfo, "Bhutan and Tibet in European Cartography (1597–1800)," <http://www.bhutanstudies.org.bt/publicationFiles/ConferenceProceedings/SpiderAndPiglet/9-Spdr&Pglt.pdf>

⑦ Montanus, Arnoldus. *Atlas Chinensis*, London: Tho. Johnson, 1671, p. 668, p. 680.

⑧ Moore, Jonas, *A new geography with maps to each country, and tables of longitude & latitude*, London, 1681, p. 2: 6–7, 9.

⑩ 对“土伯特” (Tibet) 这个名称的来历，国内学者如牙含章、江慰庐、安瓦尔·巴衣图尔、克由木·霍嘉、姚远、安才旦、李文实、吕一飞、霍巍、常凤玄、尹伟先、朱文旭、叶拉太、姚大力、赵小刚、王启龙、南晓民，西方学者路易·巴赞、哈密屯和毕鄂等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的角度作过研究，本文不涉及词源考据，故从略。参见路易·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第 1328—1353 页；Behr, Wolfgang. "Review of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by Stephan V. Beyer," *Oriens*, Vol. 34 (1994), pp. 558–559.

⑪ 就东译西语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则沈国威氏《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所述甚详。

⑫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 年，第 52—54 页。

⑬ 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年，第 15—27 页。

提醒国人注意西方分类中的 Tibet 跟 China 也有类似的性质,所以力主恢复中国概念体系,可谓卓见^①。

“西藏”这个明代概念^②最先是指卫藏地区,今指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康区和安多,用于翻译 Tibet 不合适;而“藏区”这个族性地理概念显然是现代民族识别以后的产物,用于理解历史上的青藏高原亦不适宜。“吐蕃”这个汉文称呼起自唐,迟至明代都在使用^③,延续近千年,但因时而屡有变动,亦非西文 Tibet 所指。为避免混淆,本文根据任乃强的意见,将 Tibet 及其变体词音译为“土伯特”^④,意在松动西方学界假定的它跟藏文、汉文中相关概念之间的一致性。

类似的,在研究欧洲汉学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发明的 China 这个概念所指并非中国:它是 1510 年代欧洲航海者在海旅途中发现的一个地理概念,当源于梵语之称呼中国,但完全没有“中国”的意思,是一个把中国对象化的概念。“中国”作为自称时,它带着一整套天下观和相应的地理分类体系。China 这个称谓完全不含这些内容。相反,欧洲发现它以后,对它进行重新解读,逐渐把它嵌刻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以民族—国家为归宗的地理分类体系中,成为“中国”概念的一个对抗性概念。只有松动 China 和“中国”的严格一致关系,我们才会明白西方学者所理解的 China 在任何时代都只是中国之一部分而已^⑤,才有希望在研究中摆脱欧洲观念体系尤其是单一民族—国家观念对中国体系的束缚,并清晰地认知其意识形态背景及其与中国体系之间的差异。据此,本文根据明末艾儒略的音译,使用“知纳”。^⑥这可以避免跟译自印度梵文的“支那”概念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塑造的、带有鄙视意涵的“支那”概念发生关联;其次,这个译语在汉文中相对较为陌生,我们对它尚未附着上情感价值,可以疏离“China”在人们心目中已经造成的等同于“中国”的印象。

此外,并非不重要,有的欧洲作者在当时曾留下记录,但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得到公开传播,有的相隔数世纪才得以出版而为人所知。在文献史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与梳理客观的历史过程不同,本文梳理的是地理观念史,因此只从该文献对地理观念产生实际影响的时间点来考虑其意义,而不从其书写时点来考虑其在时间序列中的有无。

13 世纪以后欧洲有关藏文化区域的直接知识传统

1693 年,法国耶稣会士艾吾瑞尔(Philippe Avril)曾说,西历 1256 年后的半个世纪当中,若干受遣前往鞑靼大汗那里的方济各僧侣访遍土伯特王国的各个地方。^⑦这个说法过于乐观或夸张。1904 年卡罗曾追述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以前欧洲有关藏文化区域的知识谱系。根据他的看法,18 世纪以前到过土伯特的有鲁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安奇德(António d' Andrade)和白乃心等人。^⑧实际上西历 1255 年鲁布鲁克(William de Rubruck)从哈刺和林蒙哥汗的宫廷返回欧洲后,在旅行记中提到畏兀儿介于撒拉逊和

① 吴世昌:《地域正名》,收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卷 1,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年,第 496—505 页;原载 1934 年 10 月 26 日《大公报》之《史地周刊》。

② 蔡志纯:《从藏博到西藏地名演变考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③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4、1053、1186—1187 页。

④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第 54 页。

⑤ 中国和欧洲—西方“汉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有差异;沈卫荣(《在我们的国学教学实习基地——四川省壤塘县藏哇寺行记》,《中国民族》2013 年 12 期)指出中国的“大国学”是研究诸族的,包括藏学和小国学汉学等。严绍璁(《“汉学”应正名为“国际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6 月 1 日)亦有类似见地。更早些时候,桑兵在《国学与汉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的“序言”中已对此议题有过讨论,惜乎没有后续深入的阐述。此外,阎纯德(《异名共体之汉学与中国学》,《国际汉学》2012 年第 2 期)认为“汉学”“中国学”异名共体;计翔翔(《“汉学”正名》,《浙江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主张用“汉学”来包容“藏学”“蒙古学”等。对西方汉学进行批判、反思的,包括顾明栋(《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学术月刊》2010 年第 12 期;《Sinologism (London: Routledge, 2013)》)、周宁(《汉学或“汉学主义”》,《厦门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王海龙(《汉学的悲剧》,《世界汉学》2003 年第 2 期),他如郑永年、李焯然、陈启云、张耀铭等学者都有过深刻的揭示。张西平(《国学与汉学三题》,《清华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 期)、张耀铭:《中国崛起与“中国学”的本土化》,《四川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等呼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立场来书写本土知识体系。

⑥ 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32—33 页。2017 年郝瑞教授在相关讲座中将其译为“柴纳”。

⑦ Avril, Philippe. *Travels into divers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693. p. 162.

⑧ Desideri, Ippolito. *Il Tibet (Geografia, Storia, Religione, Costumi) secondo la relazione del viaggio del P. Ippolito Desideri (1715—1721)*. Carlo Puini ed. Roma. 1904. pp. xv—xl.

哈刺和林之间；畏兀儿以东的群山里有唐古特，其外即土伯特（Tebet）；土伯特之外即女真和索伦（Langa & Solanga）^①。这应是他从今新疆地区前往哈刺和林的旅途上获得的知识。

马可波罗于西历 1275 年至 1291 年间在中国；其游记说土伯特^②州属于大汗，跟蛮子大省和其他非常大的省份相邻，离成都只有五日的路程，并于彼地旅行二十日。后世的研究表明，以五日入土伯特州计算，此地当为雅州（今雅安）。^③此处所说的土伯特州是靠近成都到云南驿路一带的地方。他说土伯特境内有八国，后世学者认为当是土番宣慰州所领八个地区。^④此外，他谈到上都时，说有两类偶像崇拜者巫师，分别称为“土伯特”（Tebet）和“克什米尔”（Kesimur），又称为“法师”（Bacsi），有广大的寺院，大如小城，每寺有两千余人。^⑤这里的“土伯特”当指当时的萨迦派僧侣，亦指乌斯藏萨迦派祖庭一带。

之后鄂多立克（Friar Odoric）从海路入华，陆路归国，在元朝期间大约是西历 1322 年至 1328 年；返程时，离开契丹（当指北京）50 天后，至约翰之国（当即唐古特）；尔后到达与印度接壤的土伯特（Tibot/Tybot）大王国，出土伯特后即山老^⑥。劳费尔和斯文赫定都认为他只不过是从鄂尔多斯沿着甘肃、蒙古等类似鲁布鲁克所走的路线。“到达称为土伯特的大王国”并不意味着他进入土伯特乃至拉萨；所以劳费尔推测鄂多立克所说的土伯特应当是拉达克^⑦。

他们认为上述提及的所有王国或区域都臣服于蒙古大汗。这是对其时蒙元体系的理解。这三家尤其是马可波罗提供的知识奠定此后欧洲想象土伯特的基础，但他们有关土伯特方位的三种说法差异极大，从符号链接性来说需要进行整合，并由此提出新知^⑧。

至迟在 1599 年至 1600 年的世纪之交，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就曾尝试根据象征符号和所指的链接性将不同的说法整合到一起：他收录鄂多立克游记的英译本，涉及土伯特部分时，指出 Tebek 就是 Thebet；而在其拉丁文原本中，则直接注明此即鲁布鲁克所用的 Tebet。在鄂多立克游记谈及天葬习俗时，哈克卢特注明：“这一人群的同样故事亦见鲁布鲁克。”^⑨1613 年普查斯在述及土伯特（Thebet）葬俗时，亦注明鄂多立克和鲁布鲁克所说的是相同的。在涉及性别风俗、天气咒师、土伯特包括八王国等内容时，则明显采用马可波罗游记的说法^⑩。这表明至迟到 17 世纪初，欧洲学者已经试图根据符号及其所指的链接功能，将蒙元时代的三家知识整合起来。这种整合是以欧洲的民族—国家标准来进行的。譬如普查斯在 1625 年版《朝圣记》的索引部分就整合鲁布鲁克、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提供的知识，把 Tebet 和 Tebeth 视为分异但相关联的两个条目：把前者视为属于鞑靼人的一个人群，把后者视为一个行政单位省，但二者条下的内容都涉及土伯特的风俗习惯，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异。这一做法彰显欧洲学界想象土伯特的路数；只不过这一想象不仅与现实不符，与他在注中的逻辑亦不一致：比如他说“土伯特之人”（the people of Tebet）^⑪，表明 Tebet 不是指人群，而是地域。由此可见他试图在符号上作改动，将土伯特放入到欧洲古式民族—国家框架的路

① 此据柔克义；大概是指满洲和朝鲜之一部。参见 Rockhill，见 William de Rubruck, 152–153. 注 5。

② Polo, Marc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1938, 271. Fn. 3. Tebet, 又写作 Thebeth.

③ 相关讨论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A.J.H. Charignon 注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1936）年 446 页注 1；温玉成：《马可波罗游历过“吐蕃州”》，《中国西藏》2013 年第 1 期；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年，第 19、55—58 页。

④ 前揭方国瑜、林超民书，1994 年 55 页。他还谈到邻近的省份如建都（Caidu，今丽江附近），哈刺章（Carajan，当即云南）、匝而丹丹（Zardandan，今云南保山一带）、緬（Mien，今蒲甘一带）和班加刺（Bangala，今缅甸南部一带）等。Polo, Marc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1938, p. 273, 276, 281, 286.

⑤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1954（1936）年，277—280 页。

⑥ uno grande regno che si chiama Tibot/Tybot. Desideri, Ippolito. *Il Tibet*. 1904. p. xxiii, xxv.

⑦ Berthold Laufer, “Was Odoric of Pordenone ever in Tibet?” *T'oung Pao*, Vol. XV. Leiden, 1914. Sven Hedin, “Early European Knowledge of Tibet,” *Geografiska Annaler*, Vol. 1, 1919, pp. 290–339, esp. p. 305.

⑧ 此外，欧洲知识界对有关鞑靼的知识的整合，早于和重于对有关土伯特的知识的整合（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1613. pp. 335–342）；而在他们发现“知纳”（China）这个地理概念以后，其重点又转而整合不同时代有关知纳的地理知识系统：从托勒密的地理分类系统、蒙元时代的地理分类直至新的有关知纳的分类系统。

⑨ Hakluyt, Richard. *The principal nau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made by sea or ouer-land, to the remote and farthest distant quarters of the earth, at any time within the compasse of these 1600 Yeres*. London. 1599–1600. Vol. 2, p. 52, p. 64.

⑩ Purchas, Samuel. *Purchas his pilgrimage*. London: William Stansby. 1613: 361

⑪ Purchas, Samuel. *Purchas his pilgrimes*. London: William Stansby. 1625, p. 23.

子困难重重。^①

1559 年英格兰医生库宁罕 (William Cuningham) 在《宇宙之镜》的亚洲部分, 根据马可波罗的地理概念分类体系, 列出契丹 (Chatay) 和蛮子 (Mangi, 当为南宋) 两个区域; 蛮子区域分为九个王国, 其中之一即土伯特 (Thebet): “该省为大汗即东印度、南印度之主所居; 印度所有的国王都受其统辖”。^② 1578 年英国数学家博恩氏 (William Bourne) 在《旅行者珍宝》中的涉华部分, 对土伯特省的叙述采库宁罕所述, 唯一不同的是他为土伯特加上经纬度: “经度 168 度, 纬度 3 度 20 分, 距离伦敦东偏东南 7670 英里, 月变时间晚 9 小时 44 分钟; 最长的一天是 12 小时 10 分钟。”^③ 这表明它是一个地点, 而不是一个区域。^④ 费吉 (Robert Fage) 以“土伯特”为城市名。1658 年他在《世界素描》中说鞑靼最著名的五座城市是土伯特、撒马尔罕、汗八里 (北京)、大都或鞑靼以及匝斯贝 (Zaaspe) 等。^⑤ 这个传统延续甚久。1794 年, 鲍德温 (G. A. Baldwin) 在新系统地理学中提出亚洲六区域的第五区为大鞑靼, 其第三部为蒙古鞑靼, 主要城市即土伯特。^⑥

黑棱 (Peter Heylyn) 注意到上述土伯特所指或为区域或为地点的两难, 在《宇宙志四书》(1652 年) 中提出, “土伯特” (Thebet) 区域之得名, 乃是取自同名的城市。此城是“法师” (Abassi) 即偶像崇拜者教宗的首府, 其经纬度是: 经度 138 度 50 分, 纬度 44 度 0 分。^⑦ 若以当时福岛的零度经线 (格林尼治以西 14 度) 起算, 此坐标地当在今吉林省长春市西北马家窝堡一带。

意大利思想家博特罗 (Giovanni Botero) 曾在《世界最著诸国史记》(1601) 中谈到史上最伟大的鞑靼帝国, 说其下“有诸多伟大的王国和强大的省, 比如唐古特,” 以及诸如“哈刺章、土伯特和建都”等。^⑧ 这是马可波罗的知识体系。他为什么只提这些部分呢? 我们遇到欧洲知识界变动中的亚洲地理分类体系。

把土伯特归入“鞑靼”范畴

14 世纪中期蒙元崩溃、明朝代兴。欧洲知识界并没有及时掌握这一历史变动; 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 这一变动才以“知纳”话语的出现并突出地以其升起得到曲折反映。博特罗已经把鞑靼帝国跟欧洲刚发现不久的“知纳”王国分开。他们最初把土伯特归属鞑靼帝国, 后来才将之归属到“知纳”之中。

他们为何把这一区域归入鞑靼区域? 这归功于马可波罗: 他报道土伯特臣服于鞑靼大汗。^⑨ 1613 年, 普查斯在他的《朝圣记》第九章谈及鞑靼原初居住地是在贝尔金 (Belgian) 山之外, 内中有不同民族, 总称莫格利 (Mogli), 包括七部落如鞑靼、唐古特和土伯特 (Tebeth) 等; 成吉思汗时征服诸部, 但它们依旧沿用鞑靼这个名字^⑩。1615 年艾维特 (Pierre d'Avity) 在《世界政体记》中对鞑靼帝国麾下诸王国、诸省的信息, 无疑也是来自马可波罗游记^⑪。他们用理解超王国的中国体系的唯一知识资源是欧洲的帝国观。

1646 年, 英国作者司笔 (John Speed) 著《世界各著名地展望》, 把契丹界定为成吉思汗真正的后嗣鞑靼

① 一般认为, 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始自 17 世纪中期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19 世纪以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定型。笔者对此稍有不同意见, 认为欧洲在此之前尚有一个古式的民族-国家观念时期。因篇幅和文章主旨, 此不赘述。

② Cuningham, William. *The cosmographical glasse conteinyng the pleasant principles of cosmographie, geographie, hydrographie, or navigation*. Londini. 1559. p. 197.

③ Bourne, William. *A booke called the treasure for traueilers*. London: By Thomas Dawson. 1578. pp.20-21.

④ 这些数据给人的印象是土伯特所在地的位置“准确”得不容置疑。从其时极具绘制者梦幻 (fantasy) 想象的地图来看, 康塔尼利 (Contarini) 根据当时各种版本的曼德维尔旅行记 (其实他把这说成是一个 isle, 这可能是岛屿, 有可能是高出周边的群山) 在 1506 年制作的地图把土伯特置于海岸边, 离当时发现的加利福尼亚不远。稍后瑟维绒 (Jan Severzoon, 1520)、范恩 (Oronce Fine, 1531) 和加拉颇达 (Callapoda, 1561) 的地图踵之。1544 年塞巴斯蒂安 (Sebastian Cabot) 地图把土伯特 (Thibiote) 置于里海以北。在康塔尼利前后, 也有绘图者根据马可波罗的材料, 把土伯特置于印度、蛮子和契丹之间, 或孟加拉、唐古特、蛮子等之间。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p. 307, p. 309.

⑤ Fage, Robert. *A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world*. London: J. Owsley. 1658. p. 54.

⑥ Baldwin, George Augustus. *A new, royal, authentic, complete, and universal system of geography*. London. 1794. Book II, p. 3.

⑦ Heylyn, *Cosmographie in four bookes*. 1652. p.3, p. 202, p. 258.

⑧ Botero, Giovanni. *The trauellers breuiat*. London: Bollifant. 1601.

⑨ Polo, Marc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1938, p. 271. 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游记》, 1954 年, 第 447—448 页。

⑩ Purchas, Samuel. *Purchas his pilgrimage*. London: William Stansby. 1613. p. 335, p. 337.

⑪ Avity, Pierre d', sieur de Montmartin. *The estates, empires, & principallities of the world*, London: Adam Islip. 1615. pp.700-702, p. 708, p. 714.

大汗的帝国，在南部与知纳以长城为界隔开；其下诸省包括契丹、唐古特、喀慕、太原府和土伯特等。他说这些省份相互没有多大差异，也跟属于契丹王国的其他鞑靼部分差别不大。^①

1652 年黑棱提出古代鞑靼最著名的区域有六，首推土伯特，最末才是鞑靼；鞑靼分为五部落，包括蒙古、叶赫蒙古（或称大蒙古）、索漠蒙古（水蒙古）等。成吉思汗压服五部后，复占有土伯特和唐古特。诸部首长把他扶上放在毛毡之上的座位，尊称他为王。^② 类似的说法亦见法国耶稣会士神学家佩道（Denis Petau）所著《世界史》（1659）。经这一编排，土伯特俨然成为古鞑靼的一部分。^③

来自实地的信息也“坐实”这是鞑靼之地。1667 年基歇尔根据白乃心提供的游历报告，在《中国图说》中说从西宁越过卡尔梅克沙漠，用三个月的时间到拉萨。这段路上“鞑靼牧民习惯了沙漠的环境，在一定的季节游牧于这个地区。”^④ 如果说此前这个广阔区域都是由想象的鞑靼区域来支撑的话，这个报告用实在的材料填充之，使之丰满起来。类似的填充如 1673 年汪勒（Nathaniel Wanley）受鄂多立克记载和前述以土伯特为鞑靼之区的影响，在《小世界奇事》中谈到“在土伯特（Thebet）的鞑靼人中”以头骨做碗的风俗。^⑤

1679 年塞勒（John Seller）在《小地图集》中，正式排出土伯特在大鞑靼（亚洲鞑靼）的地位：大鞑靼分为五部分：沙漠鞑靼、乌兹别克鞑靼、土耳其斯坦、契丹和真鞑靼。土耳其斯坦有四部，依次是察理斯（Chialis；莫登 [Robert Morden] 认为此即吐鲁番）、和田（Chiartiam）、土伯特和契丹湖。^⑥ 稍后在《新地理学》（1681）给出的印度地图中，可以看到高加索山（即喜马拉雅山）以北都属于鞑靼，另有小字写出土伯特（Thibet or Thobrot）土耳其斯坦字样，东邻知纳。这样大莫卧儿帝国的北邻就是土耳其斯坦，而不是土伯特；而鞑靼部分也只需涉及土耳其斯坦，无需提及土伯特。^⑦ 不过，1685 年塞勒在《新地理学系统》中把亚洲分为九部，最末为鞑靼，下含撒马尔罕、别克（Bek）、喀什噶尔、土伯特、唐古特和卡尔梅克等六区。^⑧ 1682 年尚柏林（P. C. Chamberlayne）和散菴（Nicolas Sanson）的地理学著作中也沿袭这一分类，把土伯特和土耳其斯坦等同，居乌兹别克以东，属大鞑靼的一部分，土伯特国有同名的城市土伯特与和田（Chotan）。^⑨ 踵其后以土伯特归属土耳其斯坦的还有杜瓦勒（P. Duval）和莫登等。^⑩

1580 年代以后的新知

16 世纪末，欧洲关于土伯特的知识，因耶稣会士在喜马拉雅山西部和英国商人费其（Ralph Fitch）等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地带的活动而得到更新，伴随而来的是新的称呼、新的知识。1582 年耶稣会士阿卦维瓦（Rodolfo Acquaviva）在写给罗马的信中提到一个叫博坦（Bottan）的山地民族（nation），指的就是土伯特；费其也提到孟加拉以北的博坦人（Bottanter）。随后耶稣会士们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报告中所使用的名字，紧紧地跟这两个名字相联，因撰写者母语的关系，在 Botenti 和 Pettent 之间变动；而他们之选择性地使用“Potente”（强大的），则有寻求欧洲后方资助的意图。当欧洲学界较多地使用 Tebet 及其变体时，这个新名词就一度消失，直到 17、18 世纪之交才用来专指不丹。^⑪

① Speed, John. *A prospect of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vworld*. London: John Legatt. 1646, p. 40.

② Heylyn, Peter. *Cosmographie in four bookes*. London. 1652. p. 3, pp. 202–203.

③ Petau, Denis. *The history of the vworld: or, An account of time*. London: J. Streater. 1659. pp. 77–80.

④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年，第 319 页。

⑤ Wanley, Nathaniel. *The wonders of the little world*. London. 1673. p. 73.

⑥ Seller, John. *Atlas minimus*. London. 1679. p. 50.

⑦ Moore, *A new geography with maps to each country, and tables of longitude & latitude*. 1681. p. 2, pp. 6–7, p. 9.

⑧ Seller, John. *A new systeme of geography* London, 1685, pp. 113–114.

⑨ Chamberlayne, Peregrine Clifford. *Compendium geographicum*, London, 1682. p. 7, p. 84, p. 132, p. 134. 亦参见 Sanson, Nicolas (1600–1667), *Cosmography and geography*, London: S. Roycroft, 1682, p. 273, p. 304, p. 308. 1861 年日本学者箕作省吾沿袭西方地理分类，把和田和图伯特归为一个地理单元，其源头即在于此。箕作省吾：《坤輿图识补》卷 1，美作梦霞楼，弘化二年（1861），第 6—7 页。

⑩ Duval, P. *Geographia universalis*. Trans. by Ferrand Spence. London: H. Clark. 1685. P. 154. Morden, Robert. *Geography rectified*. London. 1688. p. 391. 1692 年，在土伯特归属鞑靼的主题下，Mlle de La Roche-Guilhen (1644—1707) 写出爱情历史剧《成吉思汗》（*Zingis a Tartarian History*，trans. by J.M. London. 1692）。

⑪ Gandolfo, Romolo. *Bhutan and Tibet in European Cartography (1597–1800)*, pp. 96–101.

意大利传教士伯立文在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待了多年以后写给教皇的意大利文报告，提到该地生产的丝绸销到老挝（Lais）王国，再从那里销往土伯特（Thibet）王国：因为这丝绸尽管不如知纳的那般精良、精致，但却更粗更耐用。^①从今日的地理格局来看，老挝与中国藏文化区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为什么伯立文单单提及土伯特王国？这着实让人费解。耶稣会士 1628 年前后在日喀则时发现卫藏东邻交趾知纳，^②这可能是最好的解释。无论怎样，这一观念导致的逻辑后果就是：老挝跟土伯特接壤。这跟下文所述欧洲学者以莫卧儿跟云南—四川接壤造成的逻辑后果类似。由此可见，伯立文所说的土伯特，不应当是鲁布鲁克、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等所至的土伯特。

曾德昭（1585—1658）在华多年，著有《中华帝国史》行世（1642）。^③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土伯特”的西班牙文写法 Tibet（英译本沿用）这一后世的通用名，但这不是最早的，因为 1640 年代以前吕布朗（Vincent Leblanc, 1554—ca.1640）在《世界考察记》中已经把 Tebet 跟 Tibet 视为同一。他提到来自土伯特（Tebet or Tibet）大王国和契丹的报告^④。来自土伯特大王国的报道，当即安夺德所写的报道^⑤。现在比较确定的是早在 1624 年，安夺德在第一份有关古格的葡萄牙文报告中就已经使用 Tibet 这个拼写法，^⑥并非此前所说的 18 世纪。^⑦新的拼写法与前述有关土伯特的知识传统无关：它来自新的实地信息。

安夺德在扎布让传教，^⑧从当地人那里初步了解当地的地理分类，对“土伯特”有了更多的补充。他在 1626 年写的报道中认为，土伯特（Tibèt）由古格（Cognè）、拉达克（Ladac）、玛域（Mariul）、日土（Rudoc）、卫藏（Vtsana）和另两个位于东边的王国组成，这些王国加上大蒙古（Sopò）王国，总称为大鞑靼。后者一部分邻近知纳，一部分接壤莫斯科，称为大鞑靼帝国，据称有上百贡税国（tributarij）^⑨。伍昆明认为他所说的两个东部王国是康和安多^⑩。从当时的分类来看，这是可能的，但它们并非王国^⑪。安夺德氏显然不知道明朝对乌斯藏的多封众建政策和乌斯藏僧侣前往大明朝廷朝贡、受封和任职、西藏文明东向发展^⑫的情况，亦不知此际噶举派势力正盛，卫藏地区的世俗权力由藏巴汗掌管。如果他了解这些情况，欧洲的政体观能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格局吗？根据当代人类学家散繆的看法，不能用欧洲的国家概念来理解藏区的政体；跨区域相互交错的教派治理才是当地的政治形式。^⑬安夺德没看到这些复杂性，所以只简单地沿袭欧洲的既有知识传统，把土伯特归入鞑靼帝国。

在他的建议下，孟加拉耶稣会负责人派传教士卡塞拉和卡布拉尔等人经不丹前往卫藏，最终前往契丹，以确定其所在。当他们在不丹了解到当地的地理知识体系时，如何把它跟欧洲既有的地理分类系统整合，成为当务之急。1626 年卡塞拉的报告把索波等同于欧洲人理解的鞑靼，把藏传佛教中的想象地香巴拉

① Borri, Cristoforo. *Cochin-China containing many admirable rarities and singularities of that country*. London: Robert Raworth. 1633. 第十四面。

②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 年，第 302 页。

③ Semedo, Alvaro. *Imperio de la China*. Madrid, 1642;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E. Tyler. 1655.

④ Leblanc, Vincent. *The world surveyed*. London. 1660. p. 83.

⑤ “An Appendix: or Special Remarks Taken at Large Out of Athanasius Kircher's Antiquities of China,” In Nieuhof, Johanne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London. 1669. p.26.

⑥ Andrade, Ant 6 nio d' , Venceslao Pantaleone. *Lettere Annve Del Tibet Del MDCXXVI, E Della Cina Del MDCXXIV*. Roma: Corbelletti. 1628. p. 3. 此前维基百科认为英文 Tibet 这个词最早是 1774 年英国人波格尔的报告中首次使用。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bet#Names>. 访问时间：2015 年 2 月 24 日 23:12。

⑦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bet#Names> accessed: June 1, 2018. 12:30.

⑧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C3%B3nio_de_Andrade. 访问时间：2015 年 2 月 24 日 23:12。

⑨ Andrade, Ant 6 nio d' , Venceslao Pantaleone. *Lettere Annve Del Tibet Del MDCXXVI, E Della Cina Del MDCXXIV*. Roma: Corbelletti. 1628. pp. 5-6. 亦参见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 年，第 187 页。

⑩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 年，第 187 页。

⑪ 有关这些区域的形成，可参见叶拉太：《古代藏族地域概念的形成与演变》，《中国藏学》2013 年第 2 期；石硕：《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中国藏学》2014 年第 3 期。

⑫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沈卫荣：《评美国藏学家魏里的〈明朝的喇嘛进贡〉——兼论元明时期的西藏政策》，《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2 期；稍早，有李铁铮和杜恒泽氏的著述；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的丰富研究，亦参见王启龙、邓小咏：《20 世纪上半叶藏区政治研究评述》，《西藏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⑬ Samuel, Geoffrey. *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

(Ximbala) 理解为契丹, 把甲那 (Guena) 理解为知纳, 而土伯特即博坦 (Potente)。卡布拉尔在 1628 年写的报告中说卫藏北邻鞑靼, 东边是交趾知纳; 他认为香巴拉不是契丹而是鞑靼, 更靠北。诚如伍昆明批评的那样, 他们不知道, 也不懂得当时藏区的这些部分“均属中国管辖的地区”。^① 无论怎样, 我们也看到新知对欧洲既有地理知识谱系带来的巨大扰动。

1661 年, 汤若望挑选白乃心和吴尔铎从北京经土伯特前往欧洲。他们从北京出发, 经西宁, 越过鞑靼的卡尔梅克沙漠, 三个月后到达鞑靼人称为巴兰托拉 (Barantola) 的拉萨王国 (Regni Lhasa); 他们在拉萨待一个多月后前往尼泊尔。^② 这个新出现的“拉萨王国”如何整合到既有的地理知识谱系之中呢? 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把马可波罗、安夺德和白乃心的记录整合到一起。他说:“现在天德 (Tenduc) 是鞑靼的一个王国; 鞑靼是由许多其他王国组成的, 譬如拉萨王国 (此即鞑靼人所称的巴兰托拉), 内特尔 (Nethel)、土伯特 (Tibeth)、马朗加 (Maranga) 等王国, 以及卡尔梅克沙漠, 它与知纳人之长城接壤。绝大多数地理学家把知纳王国与契丹王国混淆”; 通往天德的路向东经过高加索的斜石坡三日以后, 即来到世界最高山, 当地人称为朗古尔 (Langur), 是拉萨王国最高的山。这个地区叫贝拉日 (Belor) 王国, 即契丹的约翰长老的主要王国; 王国东边的人群, 当地人称土伯特 (Thebeth); 有一座至为壮丽辉煌、举世无双的城市, 即土伯特王国的扎布让 (Chaparangue) 城, 其首府是拉达克 (Radoc); 土伯特王国是大契丹所属王国之一。大契丹包括知纳人长城的内外。^③

在华耶稣会士们从知纳获得了解土伯特的新途径和新信息。1642 年曾德昭在《中华帝国史》中提到, 从陕西省有商队前往强大的 Tibet 王国, 带有多种商品, 尤其是丝绸制品、波斯蓝和茶。^④ 曾德昭确定汉文中的乌斯藏和土伯特即安夺德、吕布朗等人所理解的 Tibet。这是欧洲学界首次将一个欧洲概念跟汉文的“吐蕃”对应起来, 从而沟通此前没有交集的两个文献体。卫匡国继承这一传统。1654 年, 他在《鞑靼战纪》中提及四川省与土伯特王国接壤^⑤, 稍后在《知纳上古史》中提及汉文献中的吐蕃王国^⑥。但无论曾德昭还是卫匡国, 都不了解明朝对乌斯藏实施的多封众建政策, 以及其时第五世达赖喇嘛为清朝皇帝、后妃、太子、诸亲王授灌顶, 并受封于清廷的历史。

1669 年奥利瑞尔 (Adam Olearius, 1603—1671)《使节旅程集》中把土伯特 (Tibet/ Tebet) 王国跟云南西北、四川西边、陕西之西和西北一带、长城西端接壤。不过, 该著另一处又提到知纳的“西边是 Kiang、Vusucang 和 Bengala 诸王国”。^⑦ 最后一个可以确定为孟加拉 (利玛窦作榜葛刺); 前两个名字却让人费解。基歇尔显然把 Kiang 视为长江^⑧; 1904 年卡罗谈到“江”以外的另一个 Kiang: 这是一个具有土伯特“血缘”的部落群体, 汉人称为 Kiang, 来自三苗^⑨。据此奥利瑞尔所说的 Kiang 应确定为羌。至于 Vusucang, 安文思著中注说: 安夺德所说的卫藏 (Usangue) 必定是卫匡国所说的乌斯藏 (Usucang), 在汉人叫做西番的国土内, 位于四川省以西^⑩。确定这三个王国以后, 我们就明白奥利瑞尔用了两套地理观念: 一是欧洲地理系统, 用以说明土伯特王国, 一是汉文献中的地理系统, 用以说明知纳之西的诸王国; 它们在奥利瑞尔书中显然没有交集, 给人的印象是土伯特王国与乌斯藏和羌等三王国并存。可见, 这两套来自不同文献但实际所指

①②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 第 281—283、302—303、304 页, 第 319、323—324 页。

③ “An Appendix: or Special Remarks Taken at Large Out of Athanasius Kircher’s Antiquities of China,” In Johannes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p.24—26. p. 45. 中译本参见基歇尔:《中国图说》, 张西平等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0 年, 第 106—108、156 页。相关论述亦参张西平, 基歇尔笔下的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研究, 2003 年秋之卷。

④ Semedo, Alvaro. *Imperio de la China*. Madrid, 1642, p. 28.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E. Tyler. 1655. p.19.

⑤ Semedo,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1655. p. 304.

⑥ Martino Martini.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Monarchii. 1658. p. 311.

⑦ *The Voyages and Travels of J. Albert de Mandelslo*. In Olearius, Adam. *The voyages and travells of the ambassadors sent by Frederick, Duke of Holstein, to the Great Duke of Muscovy and the King of Persia begun in the year M.DC.XXXIII. and finish’d in M.DC.XXXIX*. London. 1669. p. 173, pp. 175—176, p. 179.

⑧ Kircher, Athanasius. *China monumentis*. Amstelodami. 1667, p. 165.

⑨ Carlo Puini, “Notizie”, in Desideri, Ippolito. *Il Tibet*, 1904. p.xxxix.

⑩ 安文思:《中国新史》,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4 年, 第 15 页; Magalhães, Gabriel de. *A new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Thomas Newborough. 1688. p. 31.

有重合的地理知识系统, 尚未得到整合。

类似的二重性如 1667 年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中提到知纳最西的陕西省, 其西北有一王国, 印度人称为 Tibet, 西鞑鞑人却称之为 Tumet, 与陕西和山西两省接壤; 他又提到乌斯藏王国与四川省接壤^①。Tumet 当为蒙古土默特部; 而“乌斯藏”则来自汉文文献。把土默特视为土伯特, 是基于音似的任意联想; 把乌斯藏与土伯特并列显然是因为两套知识体系尚未得到整合。

1673 年欧格尔毕 (John Ogilby, 1600—1676) 在《亚洲》一书中说大莫卧儿的北方接壤“乌兹别克、土伯特 (Tibeth) 的群山、斯利那加、扎布让和拉达克诸王国。”此处扎布让和拉达克显然不属于 Tibeth; 但同时他又提到莫卧儿王国的东边跟土伯特 (Thebet) 和白枸 (Pegou) 诸王国接壤,^② 表明 Thebet 包含扎布让和拉达克。他所说的 Thebet 王国跟包括群山的 Tibeth 当然不是同一个所指。

无论怎样, 这些符号的多样已经复杂到需要厘清的地步。

欧洲汉学的二重知纳观

克路士和拉达, 尤其是 1585 年发表汉学巨著《大中华王国最著礼俗风物史记》^③ 的门多萨等对知纳的理解, 有两重。

1550 年代, 伯来拉首先确定知纳的版图共十三个省, 但除与鞑鞑的边界稍微清晰外, 其余皆不清楚。1569 年克路士具体地确定知纳的疆域范围。在他眼中, 知纳和俄罗斯、日耳曼、印度、交趾知纳、老挝、缅甸、孟加拉、莫卧儿的信度和德里国、鞑鞑等接壤。他为之划出广阔的范围后, 又具体地罗列出其十三省。这两种理解可分别称之为外围知纳和省部知纳。前者范围且是动态的: 他认为知纳在历史上曾统治过印度、东南亚的爪哇、马六甲、暹罗、占城以及琉球等, 后来国王主动放弃那些地方, 将军队撤回^④。诸省和这个广阔疆域之间存在着模糊不清的地带; 外围知纳极其庞大, 土伯特当然在其内; 但省部知纳的十三省中又没有土伯特。这个矛盾有待解决。

1575 年, 拉达去掉外围知纳的划分, 仅确定出东部海岸线和其北方边界长城: 长城外有许多城镇, 是对付鞑鞑人的边哨, 知纳的国王在那里派有两名总督和三员大将。此外, 他一一列举出十五省的地理位置, 这就差不多划出知纳的版图^⑤。

门多萨 (1585) 对伯来拉、克路士和拉达的观点加以综合: 一方面, 知纳的东部是海洋, 西面毗邻交趾知纳、缅甸、与缅甸接壤的巴坦人和以撒马尔罕 (今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为首府的莫卧儿等, 西南是苏门答腊、爪哇、琉球还有日本, 北边隔长城与鞑鞑邻接; 但另一方面, 知纳又只有限定的十五省 (两京和十三省), 尽管门多萨没有举出它们的边界。^⑥

1646 年司笔 (John Speed) 在《世界各著名地展望》中通过凸显此前的中华帝国观来继承他们的二重知纳意象: “斯是巨大帝国, 从北回归线至北极的五十三度, 几四十度; 从东经 130 至 160 度, 总 30 度: 西接印度斯坦、恒河分隔后朝向欧洲一边的东印度部分, 东达秦 (Cin) 海, 北界大汗之帝国, 以高山和第 117 世王秦始皇所筑上千英里之长城与汉人隔开; 南为交趾知纳王国, 这是东印度恒河以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 无疑包含今天的西藏、新疆、中亚等, 但在具体介绍帝国的组成部分时却一下缩小到门多萨所说的十五省。^⑦

① Magalhães, *A new history of China*. 1688. p. 321, p. 3.

② Ogilby, John. *Asia*. London. 1671. p. 156.

③ Mendoza, Juan Gonz ález de.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Rome. 1585.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年。

④ 伯来拉、克路士等:《南明行纪》, 1999 年, 第 63—65、87—88、105—120 页。

⑤ Rada, Martin de. “Relacion del Viage que se hizo a la tierra de la China,” in *Revista Agustiniana Dedicada al Santo Obispo de Hipona en su Admirable Conversión a la fe*. Valladolid. 1884. vol. viii; pp. 203—204; 伯来拉、克路士等:《南明行纪》, 1999 年, 第 260—263 页。

⑥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 1998 年, 第 2—3、20—21 页。

⑦ Speed, John. *A prospect of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vworld*. London: John Legatt. 1646, pp. 37—38.

二重知纳观尚有另一表述。皮嘎菲特 (Antoni Pigafetta) 参加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 随船队回到欧洲后著有航行记 (1536 年出版), 谈到伟大知纳的国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 名叫 Santoa Raja。据说, 知纳的国王在其帝国之下有七十名国王臣服; 而后者中每一个下面都有十到十五个国王依附; 大印度地区的君主以及此前提及的君主都臣服于他, 是他的真正封臣。^① 欧洲航海者在东南亚发现的是中国的庞大朝贡体系, 它的意义在后世得到回应, 此即利玛窦和曾德昭等人为消弭二重知纳观的困难, 根据所掌握的汉文材料, 首次注意到其朝贡体系。据考, 利玛窦是从罗洪先 (1504—1564) 的《广舆图》^② 中得知, 东方有三个国家、西方有五十三个以上的国家、南方有五十五个以上国家以及北方三个国家向中华大王国朝贡, 但利玛窦并没有列出这些朝贡国的名字。这一并非无意的忽略使得那些令欧洲框架尴尬的地理范畴消失, 不阻碍他们继续建构中国为民族一国家的工程。曾德昭关于中国朝贡体系的知识袭自利玛窦, 没有发展, 但对十五省的了解则胜出甚多。^③ 这一畸重跟利玛窦的忽略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 我们在利玛窦的《中国札记》(1615) 和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1642) 中发现, 二重知纳观虽然以非常确定、界定清晰的十五省和庞大的朝贡体系呈现出来, 但内在的困境依旧。

观《广舆图》的“舆地总图”, 朵甘思、乌斯藏、土伯特、董卜、韩胡、碉门等赫然在列, 其“西夷”条内亦列出西番即土伯特, 下含乌斯藏、朵甘思等。由此可见, 他们之弱化中国朝贡体系的意义, 实因其用以理解中国的欧洲族性地理框架无法完全包容中国体系所致。

外围知纳和作为朝贡体系的知纳在表现形式上略有不同, 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 欧洲学界却曾把土伯特归属于另一个概念: 契丹 (Cathay; 或译震旦)。契丹概念在欧洲得到流传归功于马可波罗。他根据元代的观念把中国分为北部的契丹和南方的蛮子两部。1595 年以后, 印度的耶稣会士已经在探寻契丹、知纳和土伯特的关系, 其中沙勿略用功最勤。^④ 1575 年拉达提出契丹即为知纳后, 利玛窦在 1596 年专门考证, 鄂本笃在 1602—1604 年的实地探索, 皆坐实拉达所论。^⑤ 耶稣会士安夺德在 1624 年在扎布让写的报告, 发表时出版者加的标题和报告中都提及“对大契丹或土伯特王国的新发现”, 他们显然认为土伯特就是契丹^⑥。后世的基歇尔^⑦、克拉普洛斯 (Klaproth)、列维 (Levi)、麦克罕等都接受他的说法, 结合利玛窦的观点, 认为安夺德最终到的地方是知纳。^⑧ 因此, 安夺德的观点加重二重知纳观的困境。

牛合孚出使中国大清后所写的著作 (1669) 中亦可见类似的二重知纳: 一方面十五省中南方的一些省份跟土伯特接壤, 这就有很具体的范围; 但另一方面知纳又隔沙漠与撒马尔罕和喀什噶尔两王国相邻, 还远

① Pigafetta, Antonio. "A briefe declaration of the viage or nauigation made about the worlde," in Pietro Martire Anghiere. *The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VVest and East Indies*. London: Richard Jugge. 1577. pp. 445-446.

② 计翔翔指出, 此图系自朱思本《舆地图》改编而来。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 165 页。

③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 何高济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 第 7—9 页。曾德昭:《大中国志》, 何高济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第 10—26、116 页。

④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 1992 年, 第 82—83 页。

⑤ 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何高济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年, 第 48、185 页;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 1983 年, 第 549—559 页;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 1992 年, 第 84—85、97—107 页; 参见张铠:《16 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 《东西交流论谭》,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第 1 辑。利玛窦的著作经金尼阁的译述、加工, 在 1615 年面世后, 很快译为其他语言在欧洲广泛流传。

⑥ Andrade, António de, S.J. *Novo Descobrimto do Gram Catayo, ou Reinos de Tibet / pello Padre Antonio Andrade da Companhia de Jesu, Portugez, no anno de 1624*. Lisboa: Matheus Pinheiro, 1626. p. 1.

⑦ "An Appendix: or Special Remarks Taken at Large Out of Athanasius Kircher's Antiquities of China," In Johannes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 35.

⑧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 1992 年, 173 页。有个例外。1688 年莫登的《修正版地理学》认为古代所说的长老约翰之国在亚洲; 此即与中华帝国北边和西边接壤, 古代称为契丹, 实即土伯特的地方。他还引白乃心神父等的旅程和所见、中华帝国皇帝 1683 年前往西鞑鞑的旅程为证。这是把契丹挪到土伯特来实现的。他还把土伯特等同于天德和唐古特。在所有涉及土伯特的古代欧洲文献中, 莫登的修正意见引起的古代地理学争议是最大的。参见 Morden, Robert, d. 1703. *Geography rectified*. London. 1688. pp. 391-393. 不过, 1693 年艾吾瑞尔却部分支持他的观点, 认为住在天德 (Tanchut) 鞑鞑王国的达赖喇嘛 (Dalaè-Lama) 是此前统治那里的著名的长老约翰的真正继承者, 只不过他在宗教腐败时进行变革, 成了偶像崇拜者而已。参见 Avril, Philippe. *Travels into divers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693. pp. 162-163.

达孟加拉,远达把知纳跟鞑靼和印度分隔开来的大马士革群山;尤其是其第三王国陕西的西部边界越过鞑靼王国唐努^①。文字表述的这种二重性根本没法在地图上直观地表达出来。^②

欧洲地理学界的二重知纳难题因大一统之后欧洲传教士们逐渐发现这个“帝国”远超过十五省的范围而得到较好的缓解:一方面“知纳本部”(大致相当于十五或十八省)概念得以发展,另一方面“知纳帝国”所指得以扩展,填补二重知纳说的二重之间的模糊地带。1802年平克尔顿的《现代地理学》是我们所知第一部将土伯特纳入欧洲的中华帝国话语中加以叙述的地理学著作。“帝国”或许是欧洲唯一逼近中国体系的概念,但仍有不小的差异,首先就是因为它无法准确地理解庞大的朝贡体系,譬如尼泊尔向清廷朝贡。

二重土伯特观与对统一土伯特之想象

安夺德提到 Tibet 的诸组成部分,实际上其时藏文中并没有一个统一青藏高原的地理概念,是他把此名冠于当地的地理分类之上,这一分类很长时间都不为欧洲知识界所接受。相反,二重土伯特的意象丛生。

1673年欧格尔毕在《亚洲》一书中已经使用“大土伯特(Tibet)”“大小土伯特之王国”等概念^③,以说明这一地理单元内的差异性。与他一样,法国作者本尼尔稍后谈到在莫卧儿王国内晚近斗争中的失败者穿过荒无人烟的区域和群山,逃往“大土伯特”(the greater/great Tibet),尽管最终仍然被抓回。^④

就我们目前所知,将土伯特分为大小两部分,很可能是法国旅行者达卫理(Jean-Baptiste Tavernier)在1665年随大莫卧儿军队前往克什米尔王国以后根据所得新知而作出的区分^⑤:他在第九封信中谈到他跟小土伯特王族的一名王位继任者交流后,得知其国之东即大土伯特;十七八年前莫卧儿王沙热亚曾派军前往围攻,试图成为大土伯特王国之主。大土伯特国王曾派使节前往莫卧儿交涉,其随员中有一名来自拉萨王国的喇嘛医生。达卫理还得知二十年前有商队从克什米尔出发,穿越大土伯特的群山,进入鞑靼,三个月后到达契丹,后来大土伯特国王关闭这条通道;商队便改走恒河,经巴特纳(Patna)直接前往拉萨王国。^⑥可知大土伯特王国介于小土伯特王国和拉萨王国之间,更接近小土伯特王国。

1669年牛合孚(Johannes Nieuhof)的著中,二重土伯特的问题出现,并跟二重知纳观发生联系。他说知纳“南方的一些省份,跟约翰长老的诸王国、Geo(汉人以一个名字西番来统称之),以及土伯特(Tibet)、老挝和缅甸接壤。”在述及其第三王国陕西时他又说:“它与约翰长老的诸王国、喀什噶尔和土伯特(汉文统一以西番来称呼之)接壤。”云南省的西北部与西番王国接壤^⑦。在他看来,土伯特和 Geo 就是汉文所说的西番,但 Geo 跟土伯特并列,是否同一不知。该书后面所附基歇尔《中国图说》之见,把拉萨王国和土伯特王国并列。^⑧因此,二重土伯特的议题是:一方面,欧洲学界愈来愈一致地用同一个符号来理解这片广袤的区域,其与所指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另一方面,土伯特王国仅是诸多王国之一,且不具有代表性。

① “An Appendix,” In Nieuhof, Johanne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 7, p. 10. 卷首地图。

② 从信息方面来说,欧洲-西方汉学中二重知纳产生的原因是他们从两个渠道获得有关知纳的信息。一个渠道是从周边实地了解到中国朝贡体系的影响,一是从大明内部获得的大明地图、舆地信息。朝贡体系无法在地图上表达,而李晓聪则认为,除了及少为人知的《大明混一图》,大明其余的地图中,版图最西只到今甘肃一带,北方是秦汉时修筑的长城。当欧洲人把主权观念植入这一版图,版图外即被认定为非中国主权的部分,而他们则根据想象把其殖民的范围推到这个边界。

③ “The Kingdom of great and little Tibet,” Ogilby, John, *Asia*, London, 1673, p. 202, p. 199.

④ Ogilby, John. *Asia*. London, 1671, p. 156, p. 191; Bernier, François,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revolution of the empire of the Great Mogo*, London, 1676 p. 165.

⑤ 诺威克提到果定和(Manuel Godinho, 1606)、鸠韦(A. A. de Gouvea, 1613)、西利亚特(G. A. Hiriart, 1622)和安夺德都对大小土伯特做过区分。见 Braham Norwick, “Why Tibet Disappeared from ‘Scientific’ 16th–17th Century European Maps,”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arita 1989*, ed. Ihara Shoren and Ysamaguchi Zuiho (Narita: Naritasan Shinshoji, 1992), p. 637. 但当时这些材料大多没有发表,而安夺德只提到 al Gran Tibet, 并未作出大小土伯特的区分。Andrade. *Lettere Annve Del Tibet Del MDCXXVI, E Della Cina Del MDCXXIV*. 1628. p. 3.

⑥ Tavernier, Jean-Baptiste, *Collections of travels through Turky into Persia, and the East-Indies*, London, 1684, p. 2, pp. 134–136.

⑦ Nieuhof, Johanne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 7, p. 10, p. 19.

⑧ “An Appendix: or Special Remarks Taken at Large Out of Athanasius Kircher's Antiquities of China,” In Nieuhof, Johanne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 25, p. 51.

土伯特和知纳都是欧洲—西方假想为当地的名字，尽管有其来龙去脉，却被想象为应然和必然的。它们最多是逼近当地理解的世界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说，二重土伯特观和二重知纳观是其东方学想象他者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二重土伯特观和二重知纳观，是欧洲—西方现代正在升起中的一族一国意识形态框架理解和塑造他处乃至欧洲的机制、缩影和困境。他们以小土伯特王国想象大土伯特；大小土伯特概念之间的紧张类似二重知纳之间的紧张，但“小土伯特”王国变幻无常，是因为没有与土伯特对应的确定的王国，是东方学的建构；“大土伯特”亦虚虚实实，是因为当地文化世界的延展性；省部知纳是几乎确定不变的，与小土伯特王国不同；而外围知纳虚虚实实，类似大土伯特，实朝贡体系所致。

越来越沉湎于族性地理学的欧洲学界只能从象征符号和概念上入手。

1671 年的《中国图志》中“Tibet”这一形式已经占据主导，并且具备链接各个不同地方而使之组合成一个想象性地理单位的功能^①。1686 年柏应理在著中提到泰定元年（西历 1324 年）“来自 Tibet 王国的和尙（指喇嘛）”。^②这里的 Tibet 是汉文吐蕃的对译。根据吕布朗的意见，Tibet 和 Tebet 具有同一性关系；当普查斯以族性地理思维把 Tebet 和 Tebeth 视为同一，后者就跟 Tibet 同一。早在 1599 年至 1600 年的世纪之交，哈克卢特已把 Thebet 与 Tebek 和 Tebet 等同；1681 年摩尔把 Thibet 和 Thobrot 等同，而伯立和耶稣会士们在 1620 年代即以 Thibet 跟卫藏相邻^③。至此，Tibet 这个符号就基本上与各个时代的欧洲文献中的各种相关符号沟通，开始取而代之，向上溯及蒙元乃至史前时代，向其他区域近如卫藏、远如阿里、拉达克、康区、安多、塔布和工布等地，诉求自己的符号性霸权。^④

斐萨（Faria e Sousa, 1590—1649）的《葡萄牙的亚洲》第二卷（1674）可能是新航路开辟以来第一部称土伯特为省（the Province of Tibet）的著作，而 1675 年该著第三卷则是我们所知最早称土伯特为帝国的。该书谈到安夺德在扎布让听知纳商人对他所讲前往卫藏、内地的日程、契丹是臣服于大索波的城市而非王国后用了“这个土伯特帝国（this Empire of Tibet）”概念，^⑤可能是为克服王国概念的有限性与长距离范围皆被想象为土伯特的地理单元之间的紧张；不过这一概念依旧无法克服二重土伯特的难题。

1693 年，博弘（Edmund Bohun）在《地理词典》中对土伯特王国的范围有两套不同的说法。其一是在涉及其邻近地域时提出的：土伯特在土耳其斯坦喀什噶尔王国和同名城市等以南；大莫卧儿帝国以北，东邻四川省和陕西省，西接乌兹别克。其二则是直接对土伯特范围所作的：“土伯特是亚洲鞑靼的一个王国；北边是鞑靼本部和沙漠鞑靼，南边是印度斯坦，东边是唐古特，西边是玛瓦纳特里亚（Mawaralnatharia）。关于土伯特之名，人们所知不多。有人认为此即土耳其斯坦，有的则视为其一部。”^⑥显然这两套说明所据的材料来自不同的文献，尚未进行整合，所以引起混淆是必然的。但无论怎样，这些说法都提出诸部在土伯特符号上的想象性而非事实上的统一议题。

二重知纳观和二重土伯特观的交织

德西德里在 1722 年也提到大小两土伯特（deux Thibets）：小土伯特即巴尔蒂斯坦，大土伯特即博坦（Buton，类似阿卦维瓦、费其和卡塞拉等提到的博坦），国王尼玛朗杰住在列城，亦称拉达克；从这里可达

① Montanus, Arnoldus, *Atlas Chinensis*, London: Tho. Johnson, 1671, p. 668, p. 680.

② Philip Couplet,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juxta cyclos annorum 60 ab anno ante Christum 2952 ad annum post Christum 1683*, Paris, 1686, p.77.

③ 这个用法到 1798 年都存在，那是向知纳朝贡的。*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of 1794 and 1795*, vol. 1, 1798, p. xli.

④ 一个当代的典型例子。美国学者诺威克谈到 17 世纪欧洲地图中 Tibet 消失时说：“利玛窦前后的中文地图转写成西方文字后，也把西方地图中的 Tibet 消除掉。”当时 Tibet 这个用法在欧洲并未普遍，对土伯特的称呼也不固定，我们视这一表述为“Tibet”这个符号在寻求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霸权。Braham Norwick, “Why Tibet Disappeared from ‘Scientific’ 16th—17th Century European Maps,”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arita 1989*, ed. Ihara Shoren and Ysamaguchi Zuiho (Narita: Naritatan Shinshoji, 1992), p. 636.

⑤ Faria e Sousa, Manuel de, *The Portugues Asia*. London, 1695, p. 231, p. 338. 1678 年 Jonstonus (1603—1675) 在谈到以狗狩猎麝风俗时，也称土伯特为省（the Province Thebet）。Jonstonus, Joannes, *A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e of four-footed beasts with their figures engraven in brass*, trans. by J. P., Amsterdam, 1678, p. 46.

⑥ Bohun, Edmund, *A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 1693, p. 78, p. 211, p. 204, p. 391, p. 431, p. 434; p. 406; 亦参见 416 页土耳其斯坦条。

拉萨^①。这一划分影响较大。1777 年地理学家米德尔顿 (C. T. Middleton) 在《新全地理系统》中就认为土伯特分为大土伯特、小土伯特和拉萨三部分, 并无三土伯特之说。^② 德西德里对三个土伯特的划分要到 19 世纪初期才得以公开发表: 第一土伯特即巴尔蒂斯坦, 第二土伯特即拉达克, 或称拉达域 (Lhatà-yul); 第三土伯特即主要的土伯特, 称博域 (Bodyul), 拉萨是其首府。这是目前我们所知欧洲最早触及博域这个概念的, 其所指显然不包括整个青藏高原^③。三个土伯特不包括奥拉济奥在 1730 年谈到的塔布、工布、康区和安多等地^④。本质上说, 这是欧洲人根据认知当地的先后而做出的, 它反映的首先是认识进程, 而不是地理分类; 其次, 他们去掉以当地为中心的视角, 以此进程构筑一个地理分类, 纳入正在建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理分类体系之中。

这个分类系统何时才将土伯特从鞑靼范畴中分离出来? 这必须考虑欧洲东方学中的符号和概念系统: 这一分离跟知纳符号及其所指因鞑靼之一建立大清而得到扩展、欧洲的二重知纳观和二重土伯特观在 18 世纪初期真正交织并发生作用有密切关联。在东方学中, 首先值得我们追问的是鞑靼之一部建立的大清为何依旧称为知纳, 而不称鞑靼。根据散蒙的看法, 除了发辫和风俗习惯外, 帝国的法律是知纳的, 首都、最高法庭、财富也在彼处, 那里还授予学位和荣誉, 所有人都归心于彼, 可以说是鞑靼臣服于知纳。^⑤ 这是欧洲基于民族—国家观念的理由;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根据大清自称“中国”。清廷在汉文和满语中都用这个概念。^⑥ 第三, 闵明我在 1676 年根据利玛窦的意见, 认为帝国的名字自伏羲以后即不变, 但因统治家族不同而常有其他称呼, 好比德意志帝国这个称呼永远不变, 而奥地利家族统治时可以称奥地利帝国。^⑦

1716 年, 卡普清修会和耶稣会为争夺在拉萨地区的传教权, 分别向罗马梵蒂冈教廷申诉。德西德里认为应由耶稣会传教, 其理由主要有二: “一是西藏是属于中国 (China) 的, 耶稣会已在中国工作将近一个半世纪。西藏既是中国的地方, 所以它应划归属耶稣会传教的地区。二是从 1624 年起耶稣会士安夺德、卡塞拉和卡布拉尔相继在西藏阿里的古格和后藏的日喀则建立过传教会比卡普清在拉萨传教要早半个多世纪。因此, 最早占领西藏 (传教) 和有权继承在西藏传教的应是耶稣会。”^⑧ 第一条理由填补二重知纳观中的空缺而模糊的地带; 1730 年奥拉济奥的报告则涉及中国作为朝贡体系的议题: “在知纳的皇帝使自己成为土伯特之主以后, 竹巴王国, 拉达克或拉达, 和尼泊尔皆臣服于土伯特, 并自愿向土伯特朝贡。”^⑨ 第二条理由则在古格和日喀则传教, 即拥有整个 Tibet 的传教权, 继承安夺德以该符号冠于各地之上的做法, 有把 Tibet 普遍化和同质化的倾向, 从而消除二重土伯特观的困境。

1776 年波格尔 (George Bogle) 及其随从哈斯廷前往卫藏以后的报告中, 述及 18 世纪上半叶鞑靼血统的知纳皇帝对土伯特拥有主权的进程, 是他赋予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最高权威, 两名汉人 (Chinese) 总督带三千军队驻扎拉萨^⑩; 1785 年格鲁贤 (Grosier) 也以中华帝国包容鞑靼, 将土伯特列入中华帝国的朝贡国行列^⑪; 这对欧洲地理学的影响显而易见。1800 年的两部地理学著作, 维色 (Vyse) 的《新地理学指南》和温

①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Vol. 15, 1722, pp. 188–190, p. 204.

② Middleton, Charles Theodore. *A new and complete system of geography*, London: J. Cooke, 1777, p. 188.

③ Desideri, Ippolito. *Il Tibet*, 1904, pp. 24–25. 亦参见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 1992 年, 第 564 页。

④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 1992 年, 510 页。

⑤ Thomas Salmon. *Modern history: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 London: Messrs, etc. 1739, v1, p. 3.

⑥ 安文思:《中国新史》, 2004 年, 第 3 页; Magalhães. *A new history of China*. 1688. p. 4. 这个观点后来为赵冈发挥, 参见 Gang Zhao.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2006, pp. 4–23; 参见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⑦ Navarrete, Domingo Fern á ndez,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Imprenta Real, 1676, pp. 2–4.

⑧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 1992 年, 587—588 页。

⑨ Markham, Clements R. ed.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London: Tr ü bner and co., 1879, p. 310.

⑩ Markham,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1879, pp. 9–10, pp. 194–196.

⑪ 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Paris: Ph. D. Pierres and Clousier, v. 13, 1785, p. 2, pp. 229–241.

特 (Vint) 的《简明地理学体系》都依旧把土伯特划入鞑靼范畴之中；^①但两年后平克尔顿 (John Pinkerton) 的《现代地理学》中土伯特已经跟鞑靼无缘，而转到中华帝国范畴之中。^②

18 世纪前期因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从拉萨发出的报告，后期因波格尔、特纳等的旅行记，欧洲关于西藏的地理知识急剧增加，其族性地理观则在理解这些地域中进一步推进。1802 年，平克尔顿在《现代地理学》中正式提出相对于不丹而言的“土伯特本部”这个族性地理概念。^③东方学的这一族性地理化进程把二重知纳观与二重土伯特观的交织作用和西方的汉学与藏学的分异带向更深入也更隐蔽的境地。

1827 年夏英国殖民当局孟加拉医疗服务处的医生吉拉德 (Gerard) 在列城的卡农 (Kanum) 村跟乔玛交谈过，得知他正在编纂藏文语法和字典。他在写给德里总督代办弗雷泽 (W. Fraser) 的报告中说：“如果知纳人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乔玛先生的文献研究，通过基于慈善而建立的友谊的中介，将最终产生更多的关注。”“在昆纳瓦尔 (Kunawar) 的北方边界，我到达两万英尺 (6096 米)，没有雪封山。我在如果不是知纳自身那就是其边疆看到一个荒芜而宏伟的景象。”在东边的司库诺 (Skuno) 村，“有一个寺院靠近知纳的边界……旅行者在这里看到印刷文献，承载着知识，用柏木板捆起来，好似一劳永逸地合上。我带着知纳人翻译，他浏览其中一本，读了几段涉及科学的。”“在苏乐吉谷地，以及知纳领土内的若干地点，谷物种植成功。”^④两年后报告在《政府志》上公开发表。跟一个世纪前的德西德里一样，吉拉德无疑把土伯特视为知纳的一部分。但在开创欧洲—西方现代藏学的乔玛的藏学研究中，这一关系被极大地模糊。他在“土伯特地理”一文中提到拉达克时说它处于土伯特西端，是其一部分，“依旧有自己的王子，但他必须调适自己于知纳人政治观”。而拉萨是“土伯特的商业首地，政府驻地，知纳安班 (Ambans, 或大臣)^⑤驻地”。^⑥但在两年后的词典中他却说安班 (“མཚན་མཚོན་”) 是“在土伯特的知纳人 resident。”^⑦英文 resident 有外交官、殖民地官员、情报人员等意思用来翻译“驻藏大臣”都不合适。正是这部藏英对照词典以欧洲—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族性地理学来塑造藏文化观念体系，为欧洲藏学奠定一个基本的框架。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 18 世纪以前欧洲文献中有关藏文化区域的各种符号及其不同的所指跟相邻的地域概念之间的关系，梳理这些符号在欧洲现代早期经受其族性地理思想塑造、重组的历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历程跟欧洲人认知藏文化区域诸地的进程密切相关；其中由南亚尤其是拉达克而向拉萨这一方向的推进尤其关键；这是欧洲人传教和游历的进程。藏文化对各地的分类已经发挥作用，而更大的作用则是在 18 世纪以后。

我们的结论是：首先，18 世纪以前，一定意义上乃至 19 世纪初叶以前欧洲知识界对土伯特的认知是一部分人旅行经历的反映，是琐碎的，没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通过蛛丝马迹可寻出其联系性。构建内在一致性毋宁说是一个对符号和所指进行想象的过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土伯特的归属是由族性地理观和来自当地的信息在知识互动过程中确定的。

其次，这一进程极大地无视当地的事实，基本上忽略当地总体的文化世界特别是其内外关系，只在有限的和间接的意义上受到当地文化世界及其观念譬如汉文献中的记载和藏文化中地理分类的影响，以及历史事件譬如蒙元时期正式将吐蕃纳入中央朝廷治下的影响。因此，面对当地的地理分类体系，欧洲知识界极为坚持由欧洲人旅行活动而提出的地理分类，尤其是大小土伯特和三个土伯特的划分；这种坚持一度

① Vint, J. *A concise 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 or, a description of the terraqueous globe*. Newcastle upon Tyne. 1800. vol.2, p.5. Vyse, Charles. *A new geographical grammar*. London: R. Noble. 1800, p.351.

② Pinkerton, John. *Modern Geography*. London: A. Strahan. 1802. Vol. 2. pp. 145, 82–151.

③ Pinkerton, *Modern Geography*. 1802. Vol. 2. pp. 145, 82–151.

④ Duka, Theodore. *Life and works of 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a biography*. London: Tr ü bner. 1885. pp. 82–83, pp. 94–95, p. 97.

⑤ 满语安班，汉译驻藏大臣。

⑥ Csoma de Kőrös, Alexander, “Geographical notice of Tibet,”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1, April, No.4, 1832, pp. 122–124.

⑦ Csoma de Kőrös, Alexander, *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 Calcutta: Printed at the Baptist mission press, 1834, p. 350.

排斥新知,使得它在面临更为详尽的有关藏文化区的知识体系时不堪一击。范普特(Samuel van Putte)的例子对此有精彩的说明。他在1725年于印度的巴特纳见到从西藏返回的德西德里,后循他建议的路线前往拉萨。1731年,他穿上清朝(Chinese)官服,跟随一名喇嘛,取道青海湖和西宁前往北京,四年后始达;后离开北京经另一线路返回。据信他经过康区和山南;他说:“途经各地的名字在我们的地图上未曾见过。”1736年过半时回到拉萨,留待一年多以后,经西藏西部和克什米尔离开。甘多夫认为“没有哪个欧洲人像范普特那样获得有关西藏地理的第一手熟悉材料。……他掌握的藏语让他获得充足的细致信息,一丝不苟地写入日记、笔记和地图草图中”。1745年范普特在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去世前,认为其知识处于不完美境地,遂让人将其旅行日志焚毁。幸存下来带回欧洲的材料在二战中为战火所毁。^①

这结局是当地地理知识体系在欧洲族性地理分类系统中的命运的隐喻。当地的各种复杂关系在这些欧洲文献中只得到极其有限的反映;根本上这是由旅行活动来生产知识的特点。但是,这一知识进程却有一个诉求,就是成为一个知识体系,以替代或改造当地的世界观;无论何者,它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带上欧洲的族性地理分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知识必然且随时会遭受当地知识体系的挑战。如果欧洲地方生产的异域知识会带上权力面纱和权力诉求的话,当地知识体系也不缺乏权力面纱和权力诉求。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体系间相互的对话和挑战就跟政治体系间的对话、挑战乃至斗争合二为一。^②如果我们不同时揭示当地的知识体系及其地理分类系统,我们将无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及其互动后果。

第三,欧洲现代早期的东方学中,“土伯特”是跟更大的政治体连在一起的,它曾从属于契丹、尤其是鞑靼和知纳这两个欧洲东方学界先后营造出的政治概念;欧洲现代藏学兴起后有模糊这种所属关系的倾向。这些涉及土伯特的符号或概念的变动,除了当地历史有某种重大的变动外,欧洲东方学中用以理解这些变动的概念性框架体系至关重要。

[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汉藏交流现状及特点研究(改革开放至今)”(17JJD850001)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至19世纪欧洲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17BSS01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奇)

① Markham,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1879, pp. lxii–lxv; Gandolfo, *Bhutan and Tibet in European Cartography (1597-1800)*, pp. 107–110.

② J. B. Harley, “Silences and Secrecy: 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mago Mundi*, Vol. 40 (1988), pp. 57–76; Anand, *Dibyesh,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Tibet” in European Documents: With A Focus on the Period of Time from 13—18th Century

CHEN Bo

Abstract: With a focus on the signifier of “Tibet” in European documents from 13th to 18th century, this article tackl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ritical signifiers about “Tibet” and those signified. During the Mongolian Yuan Dynasty, thre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about “Tibet” were created in Europe that existed till the early modern times, leaving heavy impacts upon scholars, especiall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categorized “Tibet” under the scope of Tatar. This categorization lasted to the early 18th century when Europeans began to recategorize it under the scope of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1580, with reports sent home by European missionaries, new knowledge about “Tibet”, such as locals’ geographic classifications, were provided, with new signifiers being created, including the modern spelling of “Tibet”. The more they knew about it, they more tens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ual frames. This tension brought forth the views of double “Tibet” and of double “China”, intermingl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ir writings, which constitut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e predicament and the epitome of representations in European orientalism.

Key words: Tibet, China, Tatar, double Tibet, double China